



经典作家之王愿坚

王愿坚，这位蜚声中外的军旅作家，在世上匆匆忙忙地活了62年，就离开了人世。

人们都以为他的文学生涯是从1954年创作《党费》开始的。而他自己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1991年1月中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要我记下这样几句话：“1943年抗日战争高潮，我离开了诸城中学，第二年参加革命，穿上军装参加八路军，这是我作为革命作家的开端。”

—

1953年秋天，愿坚去福建前线东山岛采访。在回来的路上，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根据地遇见了“老区办公室”，愿坚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当年含血带泪的革命斗争故事，这些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愿坚年轻的心灵。

愿坚经过反复思考，在1954年夏天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刊登在《解放军文艺》的12月号上。他还陆续写出了《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等。

就在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议论，说没有参加过红军的同志写不好长征的小说。这一论调对愿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陆文夫在回忆愿坚时曾提起过上个世纪50年代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愿坚的一次发言。他这样写道：“当年的王愿坚好像不善于辞令，但是讲话的态度极为认真。一席话讲完之后额头上出汗，那是我们还穿着棉袄的时候。我还记得他的发言绝不是三言两语，是详细地叙述他是怎样广泛地收集资料而凝结为短篇小说的。听起来好像是介绍经验，实际上是在说明一个问题：非直接经历也是可以写成小说的。这话说起来好像有点多余。《三国演义》绝不是诸葛亮写的，但在那时候有一种议论，认为写小说必须写自己的亲身经历，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虽然写

军旅作家王愿坚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系列红军题材和军队题材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其中，《七根火柴》描述了长征途中，饥寒交迫的掉队战士卢进勇在冷风、大雨、冰雹倾泻的茫茫草地上，遇到一个生命垂危的无名红军战士，对方把藏在腋窝下的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卢进勇，请他转交给党组织，未及言毕，便与世长辞。卢进勇追上队伍，用一根火柴点燃了能够拯救更多战友生命的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

《七根火柴》发表于1958年，这部短篇小说感动了一代代读者，至今读来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其审美价值的实现，需要审美主体感知到文字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更需要通过艺术作品中渗透着生命意识的逼真艺术形象激起审美主体的审美情感，直到获得生命体验的终极审美。其中，审美主体的作用必不可少。《七根火柴》的审美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审美主体由生物生命(现实时空)层面的视觉感官对纯形式美的需要向精神时空中对内容美(生命存在及其价值与意义)的需要与追求的审美接受过程。

《七根火柴》的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是一个与审美主体紧密联系的概念，因而价值的动态实现最终必然归结为审美主体的升华与飞跃。

面对冷风、大雨、冰雹倾泻的严酷环境，卢进勇的煎熬不仅仅在于受伤、断粮，更在于他失去了和大部队的联系，这意味着他得独自承受所有的苦难，这是比残酷的自然环境和身体伤害更无情的心理煎熬。但难能可贵的是卢进勇的人生态度依旧是积极的，面对漫漫前路，他会打起精神面对，会为口袋里仅剩的一撮青稞面粉而振奋精神；而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声“同志”，他毫不犹豫地让出青稞，送到了对方嘴边，并企

王愿坚脚下的一亩三分地

■翁亚尼

得好，但是这种方向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他没有参加过长征，又不是老红军。王愿坚不敢公开反对这种议论，又要说清楚问题，那是何等吃力；一般的人都以王愿坚写的是革命题材，处境十分顺利，其实不然。作家是个光荣而沉重的职业，没有鲜花和美酒乱飞。”

面对社会上这种论调，对一个在文坛上刚刚出土的幼苗一样年轻的愿坚来说，压力是不小的。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为应该坚持写革命斗争历史这一题材，而且是能够写好的。因为这些含血带泪的故事对于在新中国出生的年轻一代太有教育意义了。人民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对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太需要让他们知道老一辈革命者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前赴后继创造了新中国和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年轻人应该不忘初心，继续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向前。因此，愿坚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宣传员，他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愿坚在《脚下要有块土地》一文中这样写过他的认识：“我的创作实践并没有背离规律，我依然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首先，我在部队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多少有些直接的生活感受、体验和积累，它使我有一条通向红军时代战争生活的路，可以凭借红军时代斗争生活去喷吐、燃烧。其次，还可以不断地积累、充实和了解那个时代。一句话，在我的脚下，也有一块自己开垦耕耘了多年的土地，它是我的‘根据地’。”

愿坚是一个性格温和、在生活中很随和的人。但是在创作道路上他非常地执著。他常常教育我们的孩子和他的学生，他说你要挖井，把水挖出来，那如果挖1米深的并挖了10口，不如挖一口10米深的井，这样才能挖出水来。

他深入革命根据地，几次重走长征路，访问当地群众和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他采访了100多位第一次授衔的老将军和9位元帅，并在其中的几位元帅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每到一处，凡有革命历史博物馆，他必去参观，并把他认为有用的资料仔细地记录下来。只要是有关红军题材的资料，他都要借来抄写成册。那时没有复印机，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工作间隙用钢笔抄写。有时我半夜醒来，只见他在灯下还在奋笔疾书。“文革”期间，造反派命他把所有的资料都烧掉，他在院子的小锅炉里整整烧了一个上午。有一份资料是陈毅元帅亲自讲述他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老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材料，是愿坚把陈毅元帅的录音整理出来的，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愿坚实在不忍心烧掉，就留下来交给了当时的上级党委。

凭借他执著地从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的搜集、积累，愿坚继《党费》以后，又写出了《七根火柴》和《粮食的故事》等几个短篇，这些小说印证了他的认识：他多少有些革命斗争的体验。比如在小说《党费》中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小孩子见了多日不见的咸菜，偷偷地拿了一根含在嘴里，却被她的妈妈黄新一把夺下，这就是愿坚在1944年秋天日

困扶起伤员并肩前行。今天再欣赏《七根火柴》时，审美主体并没有生活在红军长征的年代，但却随着情节的推进具备了一种同理心，同时又超越了简单的同理心。也就是说，审美价值的飞跃体现在审美主体的超越性上。

在审美主体看来，小腿受伤发炎、在凄风苦雨里只剩下一小撮青稞面粉的卢进勇早已自顾不暇，而那个倚着树杈、躺在污水里眼眶深深塌陷的不知名红军战士更是令人仿佛切身体会到了刻骨的绝望和寒冷。他无望而坚守的等待，却不是等待自己的生命被解救，而是企图将光和热、将生的希望传递下去。

长征之路既阻且艰，两个互不相识、身负重伤的掉队者在这一刻不是孤单的，他们身上迸出人性的火花，不但照亮了彼此，也照亮了后来者。作为审美主体，意识到彼时彼地的苦难仅仅是一个层面，因为艺术审美价值的飞跃最终体现在人的解放上。马尔库塞说：“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意识到苦难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当卢进勇将“不知名红军”的七根火柴连同党证一起交给了指导员，燃起了篝火时，作为一个审美主体，在苦难之余还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种与时代和命运抗争的力量，一种人定胜天的勇气。这也是艺术之于生活的深层价值。

审美价值的实现过程：审美主体的接受心理机制

艺术审美价值在接受中的实现，最终是通过审美主体的心理机制体现出这一动态过程的。从审美主体以一定的审美价值心理定势进入审美状态，到产生价值心理效应建构新的价值心理图式，体现为一个从低到高的价值心理发展轨迹，从审美主体的心理机制发展的动态过程可以看到艺术审美价值在接

寇扫荡时，在老家乡所遇到的类似情形；又比如《七根火柴》中卢进勇手中那块鸡蛋大的面团，那也是愿坚把战争中自己体验过的类似生活情景演化过来，变成小说中的情节。

愿坚理顺了思路，在革命历史这个丰富的矿藏中向纵深发展、创作动人的小说教育年轻的一代的同时，他自己也深受教育。

在愿坚的心中有一盏不灭的灯，这盏灯一直照亮着他几十年的创作道路，那就是革命斗争中老一辈的光辉思想。他不仅在坎坷的创作道路上执著地向前走，而且做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他创作的小说多数是在繁忙的工作以后用业余时间写的。最典型的是他自己记录的在写《七根火柴》时的情景：“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了这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花花的雪山上……”而最叫人不思议的故事是他写《普通劳动者》的情景。十三陵水库工地，每一个在京的企业部门和学校的同志，都要分期分批去工地参加劳动。当时愿坚是《星火燎原》解放军30年革命斗争回忆录编辑部的“大头编辑”，他分配在红军题材那一时期的回忆录部分。稿件都由各大军区当时的领导同志撰写，而这些同志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甚至刚刚扫盲毕业，这样的稿件修改起来难度就很大；其他各个战争时期的回忆录情况也大致如此，有的回忆录内容很好，但文字表达程度都不高。像这种情况的稿件，不管是哪一个战争时期的都纷纷交到愿坚手里。这样一来，愿坚手中就积压了不少稿件，他甚至星期日也不回家休息。所以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就一批批地都把他落下了。一直到了6月中旬，十三陵水库工程都快竣工时才分配愿坚去工地劳动。

十三陵水库工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机械化程度很低，大都是用人工操作，所以是很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抬石头就是推沙子。刚去工地时，早去的同志告诉愿坚午饭时要多吃些咸菜，因为重体力劳动出汗多。吃完中午饭，他们要翻过一个山头回驻地休息，每人还要利用这短短的休息时间每天要上交60个苍蝇给工地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部门。在工地刚开始时，苍蝇很多，但到快竣工时，要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打死60只苍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就在这样繁重的工作和体力劳动的状态下，愿坚利用短短的休息时间，在山坡上的一棵苦楝树下，用借来的一支铅笔头，在烟盒翻过来的纸上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劳动了13天，除了带回来一篇《普通劳动者》的初稿，还带回来三张劳动积极的嘉奖状。

愿坚的多篇小说，都是在这种情景下写出来的。

二

“文革”期间，愿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下放劳动三年，与外界的联系全部隔绝，甚至炊事员私下里请他帮忙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稿他都写

不出来，还是上小学一年级的他的小女儿偷偷溜进他住的小屋里发现这一情况去指点他的。“文革”后期，愿坚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分配到安徽省军区的独立师去体验生活，在那里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出操训练。半年后，愿坚被军分区领导从连队借调上来，要他写一位老红军的长篇小说。

1972年，愿坚回到北京。当时的总政文化部让他和其他同志集体修改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为电影剧本。从此，他和电影结了缘。一直改写、参与集体创作电影剧本和电视剧，从《闪闪的红星》到《四渡赤水》，他很少有自己的写作空间。《四渡赤水》由于难题较为集中，比如重大历史题材、众多的革命领袖形象和集体创作，使得这个电影剧本一直拖了8年。

愿坚在紧张的工作空隙中，还是利用休息间隙，凭着他对文学创作的执著写出了10个短篇。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小说创作。他自己说这是他的恢复期的练笔。后来他又担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主任，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使他对行政领导工作显得陌生，此后就再也没有拿起笔来。

老作家陆文夫对愿坚这一段生活有过这样的评论：“我相信中国的军事文学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的战争磨练，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果能好好地写出来的话，绝不亚于《三国演义》。王愿坚经过了20多年的磨练与素材积累，他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他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有职务、公务和事务，就是没有整块的时间务正业，正业只能当做私活来处理。王愿坚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他要把公私分清。”(文中引用陆文夫的评论，原载于1991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王愿坚的愿望》一文)

愿坚没有能写出他构思多年的红军长征的上、中、下三部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病榻上他告诉我，他一生立志要“写尽红军英雄志”。但病魔夺走了他的时间，他在1991年1月带着他的遗憾匆匆离开了人世。

三

愿坚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虽历经坎坷，但是党和人民肯定了他的成就，甚至改变了人们常说的“文人相轻”，而赢得了“文人相亲”和同行们的敬重。

1970年，愿坚到安徽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个连队“当兵”，体验生活。半年后省军区党委又把愿坚“借”到安庆军分区写一位老红军的长篇小说。在那里，他受军区领导的委托主持了一个创作学习班，因此在安徽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作家朋友。春节后，我和小儿探亲结束，要回北京，愿坚也要从安庆回到合肥，临走前安庆军分区和文联的朋友们纷纷来送行，热闹了好一阵子。第二天就要出发了，白天客人不断，晚上我们三人收拾行装。就在那天晚上，安庆市著名作家耿龙祥同志在天黑、

路滑的情况下，踏雪前来做深情的告别。老耿同志有胃病，很怕冷。而安庆市冬天雪夜的寒气并不比北国的雪夜逊色。愿坚和我都担心老耿同志的健康，但他却十分健谈。他半是玩笑半是赞赏地对我说：“老王一提到创作就什么都忘了。那天在我家吃饭，嘴上说着写作的事，拿烟的手却伸向菜盘子，把烟灰弹在菜盘子里，他把一盘炒肉丝当成烟灰缸了。”说完哈哈大笑。

老耿同志一再鼓励愿坚回京后一定要多出作品。一直谈到深夜11点多才回家。临走时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回一次头就说一句话：“多出作品。”再一次回头还是这句话：“多出作品。”

1978年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两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来我家里找愿坚，那天正好他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开会(当时愿坚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要到晚上快8点才能回到家。我把这情况告诉了两位来访者，他们说：“那就多等一会儿吧。”他们俩规规矩矩地坐在客厅里，我给他们倒茶送烟，他们不喝也不抽。过了好大一会儿，愿坚还没有回来，我就走过去再招呼他们一下。只见这两人一脸的拘谨和执著。我试图消除他们这种“紧张”情绪，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从安徽省来的，其中年少的还像个孩子，长着一张圆圆的脸，是安徽省著名诗人的儿子，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他的中篇小说。他们一定要等愿坚回来见上一面，并说：“安徽省文艺界把王愿坚传说得和菩萨一样灵。”他们还说愿坚主持的创作学习班中，有一个学员的一篇小说初稿，经愿坚辅导以后不仅发表了，而且还被翻译成英语，登在《世界文学》上。他们说：“我们哪怕见上一面，说10分钟的话也好。”

后来愿坚很快才回来，他们见面后怎么谈的，我已忘了。但是，那张孩子样圆圆的脸，那一副想要见面的殷切的神情及那“和菩萨一样灵”这句话，都久久地让人不能忘怀。

1976年年底，有两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中年老师来家里找愿坚，他们写了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初稿，想请愿坚提提意见。愿坚仔细地阅读了他们的剧本，记得有几个晚上都是读到深夜，然后作了笔记，列了详细的提纲，并和这两位老师作了几次长谈。后来剧本问世了，并拍成了电影，电影得到了好评。

1984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副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华，他要为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写一本书。写前要去长征路上走一趟，因此要有人先向他介绍一下有关长征和长征路上的情况。我国外交部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找到了王愿坚，要愿坚担任这项任务。愿坚当时只有55岁，他衣着朴素又平易近人，刚进北京饭店索尔兹伯里的房间，索尔兹伯里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所以反应很平淡。当愿坚开始讲长征还不到10分钟，索尔兹伯里急急忙忙地叫来了他的秘书，让秘书赶快把愿坚的话仔细地记下来。后来，在第二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索尔兹伯里引用愿坚所介绍的情况有几十处之多，并称愿坚为“长征问题专家”。

1984年前后，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把愿坚列入《世界名人录》，并详细介绍了他的各方面的情况。

王愿坚一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他对革命斗争历史创作的执著，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热爱和赞颂，但他始终说自己：只是党的一个宣传员。

(作者系王愿坚夫人)

王愿坚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军旅生涯和与之相关联的生活。如何将现实生活的美转化为艺术的美，需要作家创造性的劳动。一位优秀的作家，具备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传达他对客观世界审美感受的表现力。在《七根火柴》中，王愿坚一方面充分发挥厚实的生活底子，另一方面又在艺术传达中高度克制，做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认真却不较真，动情却不煽情，淡然却不平淡。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塑造了卢进勇和无名红军战士等一系列比现实更为强烈、更为集中、更为理想化的红军战士形象。

《七根火柴》仅仅2000余字，却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叙述了感人至深的情节，还对人生的核心问题诸如信念、生死和奉献进行了探讨，更在小说艺术处理上体现出内容诸要素和情感表现等方面的价值。

作为一部具有多重内涵的小说作品，《七根火柴》的美学价值层次是多方面的。“一些新的思维联系通道仿佛在突然之间被打通了，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或思索过的人生感受突然发生于脑际，强烈地撼动了欣赏者，使欣赏者有豁然贯通的顿悟之感。”这种融会贯通既涉及到创作审美主体创作的文本自身，也涉及到审美主体的艺术修养、鉴赏能力，与接受客体的审美价值容量、存在状况以及社会历史的文化特征、氛围与情状等有关。

因此，优秀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在于，经过真正的艺术鉴赏后，审美主体的欣赏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改变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结果。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